

辛亥革命与蒙古封建王公

谨将此文献给我的朋友Henry G. schwarz(乌伟君)教授

——卢明辉

一. 辛亥革命前夕蒙古社会形势

1901—1911年,清朝政府在统治中国的最后十年间,已处于岌岌不可终日的危机中。在外患日迫,国内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化的形势下,在清廷朝野上下,大造起要求拯救北部边疆危机的所谓“恤蒙实边”,“筹蒙殖民”等舆论。清朝政府迫于形势与舆论的压力,为挽救其命运,于1901年开始在全国各行省倡行“变法图强”、“立宪新政”之后,次年,宣布取消曾维护了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对蒙古“封禁”政策,号召开放蒙古地区,大力推行“移民实边”的新政策。

清朝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企图通过让内地破产流亡农民和手工业者,迁徙来北部边疆地区开垦定居。藉以达到缓和中原内地日益激化、尖锐的阶级矛盾。同时,把内地汉族流民移入北部蒙地定居,有利于充实边防,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务力量。这在当时北部边疆地区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形势下,虽属“亡关补牢”,但也具有发动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的积极意义。然而,在“移民实边”政策实施过程中,清廷和派到蒙古地区举办垦务的官吏,其着眼点完全放在增辟财源以挽救清政府日趋严重恶化的经济危机上,因此“移民实边”政策,完全变为以大量掠夺蒙古土地而敛财济困为目的了,进而使这一政策失去了“实边”以加强国防的意义,而成为专注攫取巨额土地押荒银的经济掠夺政策。

清朝政府不顾蒙古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对,强制推行“移民实边”政策,以致使其演变为以“让地夺田”为主的经济掠夺和民族压迫政策,从而为日、俄等帝国主义加紧对蒙古地区进行侵略活动,制造了有隙可乘的机会。久已对蒙古地区垂涎三尺的日、俄帝国主义殖民势力,借蒙古社会动荡混乱的形势,一面加紧煽惑、挑动一部分对清朝政府产生愤懑情绪的蒙古封建上层和“与官为仇”的蒙古武装,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另一

方面，为加紧瓜分满、蒙土地。从明争暗斗发展到军事扩张对抗，1904年，在我国东北地区爆发的日俄战争，就是日本和沙俄帝国主义为瓜分我国东三省和蒙古地区而发动的一场侵略冲突战争。战后，日、俄两个帝国主义者，为了抵制英、美等帝国主义势力插足，于1907年和1910年，两次签订《日俄密约》，划分它们侵占我国蒙古和东北地区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它们为实现各自的侵略阴谋，在其各自的势力范围内，设立各种专门机构，派遣大批间谍深入蒙古各地搜集情报，拉拢蒙古封建上层，并通过给他们支援武器，“合办企业”等一系列阴谋活动，唆使蒙古封建主进行脱离中国的分裂活动。

沙俄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实现其侵略阴谋，不断派遣大批间谍、特务，进入到蒙古地区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情报，并深入蒙旗王府、寺庙，煽惑、利诱蒙古封建王公和上层喇嘛投靠帝国主义，进行分裂民族的阴谋活动。同时，清朝政府的统治已将临末日，尤其在蒙古地区推行“称民实边”和“新政”以来，由清廷所派遣举办“新政”的官吏等贪婪昏庸，抚驭无方，更加边疆大吏、垦务官员借机贪污肥己，任意妄为，遂使广大蒙古人民因不堪其压迫掠夺，群情汹汹思变。甚至许多从前累受清王朝“皇恩”，对清廷“忠心不贰”的蒙古封建贵族和上层喇嘛等，亦因清朝政府派遣大批满汉官吏拥进蒙古社会，使其原先所拥有的各种封建特权日渐削弱，从而对清廷的抑制和重臣边吏的跋扈，产生不安和反感，进而看到日暮途穷的清朝政府已不足为恃，遂对清朝政府采取貌合神离，阳奉阴违的态度。

也有一部分蒙古封建王公和活佛等上层喇嘛，惯于淫逸奢侈、挥霍无度的糜烂生活，多年来积欠外国商人、洋行买办和汉商高利贷者债银累巨，他们将这些巨额债务，完全转嫁在其属民身上，因而，有许多蒙旗半数以上蒙古人牧放的牲畜，归外国商人和汉商高利贷者所有，使他们变成替外国商人和汉商高贷者放牧的人。

还有一些蒙古封建贵族，随着清代后期蒙古社会形势的变化，在土地买卖和阶级分化的过程中，使他们丧失了原有的封建领地和属民，从而变成没有财富和家丁的破落贵族。但是他们又不甘于这种低贱生活，于是对清朝政府怀着强烈的愤嫉情绪，谋求新的出路。他们有的在日俄帝国主义的唆使利诱下，公然与其勾连相契，妄图能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求重新获得封建特权和荣耀地位。

纵观清末蒙古社会和政治形势，可谓危机四伏，阶级矛盾与民族日益尖锐激化。一

方面是：蒙古人民聚众抗官、反清抗垦斗争此起彼伏；一部分不甘忍受封建专制统治奴役、压迫的蒙古先进知识青年和少数开明蒙古上层人物，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配合全国革命大洪流，与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和各种勾结帝国主义势力的反动阴谋活动，进行殊死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俄、日帝国主义扩张势力图谋吞并蒙古的气焰日彰，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和国内革命运动的打击下，处于国运垂危和财政赤字空前的极端困境中，骤然推行它先前曾经反对的放垦蒙古土地、敛财济困的政策。从而不仅引起蒙古族广大人民坚决反对，也促使一部分蒙古封建上层，与清朝政府离心离德。有的公然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有的久蓄异志，为谋求新出路，暗中与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相契：有的接受俄日等国贷款助械，组织训练武装力量，围堡筑垒，伺机而动，还有的聚合“马贼”、“红胡子”、“等团伙武装，打家劫舍，割据一方。绝大多数的王公贵族犹如感到末日来临般惶惶不安，莫衷一是，密切注视着未来的政治变革运动。

二、辛亥革命对蒙古王公等的震动

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各省响应，相继宣布脱离政府的统治。当时一部分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思潮影响较深的蒙古族青年和八旗驻军官兵，都积极响应辛亥革命号召，投身到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洪流中去。所有这一切，对于蒙古王公来说都是惊心动魄的异闻。其身居达官显贵的那些蒙古勋臣、王公、贵族及上层喇嘛等，此前虽与清朝政府处于离心离德的疏远状态，但是，为对付革命，他们和一切反对革命的势力结成为“神圣同盟”。

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震撼了蒙古王公、贵族等巨族的封建专制统治地位。于是面对清朝统治即将倾覆、危在旦夕的现实，他们各自的切身利益出发，虽然对采取何种行动对付革命在蒙古地区发展，主张不尽相同。但是，为维护其封建领主制的统治地位，有的主张投奔趋附库伦，以沙俄为后盾，建立脱离中国版图的“泛蒙古国”；有的主张，继续尊戴清王室，维护“君主立宪”，抵制孙中山的共和民主制；也有的主张，另立旗帜，在日本帝国军部支持助械下，成立“满蒙王国”等等。总之，在共同对付革命势力发展的前提下同部分蒙古封建上层和能与他们产生共鸣的各种政治势力，结为“神圣同

盟”，妄图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乘辛亥革命爆发混乱之机，谋求造成蒙古“独立”的既成事实。这些蒙古封建王公和上层喇嘛们，苦心思索的所谓蒙古未来命运前途，首先是与继续维护他们的封建专制统治地位的前途相联系的。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发表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中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民，是曰民族之统一”^①。

此期间在北京的蒙古王公卓索图盟喀喇沁右翼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札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昭乌达盟奈曼旗札萨克郡王苏珠克巴图尔、巴林右旗札萨克亲王札噶尔等，一面联名提出旨在维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保护蒙旗制度的意见书，抵制孙中山提出的废除专制，建立共和政体的纲领。一面又慎重分析革命形势的发展，看到完全陷入崩溃状态的清朝政府，难于挽回其彻底垮台的命运。于是由贡桑诺尔布牵头，联合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三盟各旗王公，于1911年12月3日，向清朝政府提出恢复蒙古权利的六项要求：1. 内蒙古东部盟各旗不受东三省总督和热河都统节制；2. 蒙古有权训练连队，建立警察等武装；3. 收回征收蒙古畜产品捐税权；4. 收回在已开垦地区蒙古汉民户的管辖权；5. 理藩部咨议大臣等任用蒙古人担任；6. 新制定宪法应体现蒙汉等民族平等权利。12月4日，由贡桑诺尔布领衔，联络内外蒙各盟旗驻京蒙古王公八十余人，宣布成立“蒙古王公联合会”。12月26日，又由贡桑诺尔布和清朝政府资政院议员、喀尔喀蒙古亲王那彦图、郡王多尔济帕拉穆等发起，联合内蒙古哲里木盟十旗代表：科尔沁部亲王阿穆尔灵圭、科尔沁郡王棍楚克苏隆，卓索图盟五旗代表：土默特部郡王銜贝勒色丹凌那木济勒旺保、喀喇沁部贝勒熙凌阿，昭乌达盟十二旗代表：敖汉部郡王棍布扎布、奈曼部郡王苏珠克巴图尔，锡林郭勒盟十旗代表：乌珠穆沁部亲王索诺木喇布坦、浩济特部郡王色隆托济勒，乌兰察布盟六旗代表：四子王部落郡王勒旺诺布尔、喀尔喀右翼部贝勒鼐端旺楚克，伊克昭盟七旗代表：鄂尔多斯部郡王阿勒坦呼雅克图、鄂尔多斯部贝子阿尔宾巴雅尔，喀尔喀蒙古图什业图汗部二十旗代表：喀尔喀亲王杭达多尔济、喀尔喀贝子鼐楚克车林，车臣汗部落二十三旗代表。喀尔喀车臣汗阿克旺那木、喀尔喀贝子銜镇国公车林呢玛，扎萨克图汗部落二十九

旗代表：喀尔喀扎萨克图汗兼郡王索特纳木拉布坦、喀尔喀辅国公巴彦济尔噶勒，三音诺彦部落二十四旗代表：喀尔喀三音诺彦亲王那木囊苏隆、喀尔喀三音诺彦郡王衔贝勒登索诺木，伊犁土尔扈特部十三旗代表：旧土尔扈特郡王帕拉特，科布多杜尔伯特部十六旗代表：杜尔伯特亲王索特那木扎木柴，青海和硕特部亲王格克济尔噶朗等，向清朝政府内阁官太保袁世凯上表略述：“比以武汉称兵，势牵全国，分崩云扰，莫测所终。得我公双手擎天，折鳌尊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始得保其锋鏖余生，免沈沦异类之惨。”“……近以江南各省纷倡独立，全蒙几见噬于强邻，库伦几沦于异类。故代表等痛心疾首，期复旧观。倘以共和之请，代表等恐蹈库伦之续。寸心百结，望我公详示就里，以释群疑。且此库伦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亦非深识共和之义意为何物也，实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权。复以内外蒙古各盟旗，向来困于弊政，滋扰时闻，外蒙古台站供给等苛差，尤为沉重。且从前政府凡关于整顿蒙古，多不注意，更兼对于理藩部官员及各路将军、大臣，并地方官吏等，体制悬殊，感情遂恶。故朝廷虽云优待，而部员与疆吏实际对于蒙部与苛待无殊。是以库伦之变，代表等虽欲劝告，苦无凭藉，则言不见听。拟请咨询理藩部，凡该部及各路将军、大臣等对于各蒙古盟旗，有不甚合于君主立宪政体者，择要先行扫除，并将旧时积弊陆续廓清。”在上表中还说“代表等世居朔漠，久曜王灵，于大皇帝无贰心，于强邻无异志”②。

从此一奏表中所反映的蒙古王公心境来看，首先对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统治，实行“共和”“民主”制政体，抱有巨大恐惧和反感。同时认为由于清末治蒙政策失误和各路驻蒙古将军、大臣、都统等边疆大吏，婪贪昏庸，倚仗权重位高，任意妄为，遂引起蒙古王公的不安，“感情遂恶”。以至蒙古官民不堪其压迫掠夺，群情汹汹思变。为此，蒙古王公怀着留恋昔日“皇恩”，深感“痛心疾首，期复旧观”的惴惴不安之情，急切企待当前握有清朝政府军政大权的官太保袁世凯，能以“只手擎天，折鳌尊鼎”之势，成为“再造中国四万万生灵者”，力挽清王朝的统治于狂澜既倒之中，扑灭熊熊燃起的革命火焰。

可是，当时蒙古王公面对清朝灭亡的现实，对于今后的出路，没有一致的意见。1912年1月14日，阿穆尔灵圭等内外蒙古王公二十四名代表联名，再次致电清朝政府内阁袁

世凯，电云：“元电当达览，南北协议是否有成？国会何时可开？闻库伦喇嘛称号，内蒙摇动堪虞。……前经定于十一月初一日（1月19日），集会东蒙各王公面宣德意，并谓保国之策，俟莅会再行电闻。唯钧阁政策所在暨势力如何，务请电示，俾便遵依酌办。倾东督电请备战，阿穆尔灵圭查本旗蒙兵，乘先亲王遗教，尚皆朴勇可用，夙为胡匪所畏，如蒙得益，必可效死无贰。窃谓乾坤鼎沸，仰赖转旋，无论和战，似宜原集兵力，以壮声威。……”③

在这次东蒙王公会议上，虽有的王公主张仿照库伦之举，“从清国分离出去，”“蒙古只好独立”，但多数王公意见不尽相同，主张静待大局稳定后再决定蒙古的去向。

其实辛亥革命爆发后，使蒙古王公感到巨大震动的，不仅仅是因为腐朽的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即将垮台，而是因其有着另一种社会要求。这种要求不能寄托于清王朝帝制统治的延续而得到满足，正相反，他们感到清朝统治者已不足为恃，在考虑谋求蒙古未来政治出路时，清王朝专制统治反而阻碍了这种要求的满足。所以，只有在清王朝专制枷锁被打碎时他们才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这种要求和愿望实现的可能性。这种要求在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的行动中表现得更为明确。早在1902年以后，贡桑诺尔布等与日本军政界的要人就有着频繁密切的联系，武昌起义后，贡桑诺尔布曾在北京的王府官邸，召集土尔扈特部亲王帕拉特等王公和他曾派赴日本学习军事归来的金永昌等以及喀喇沁部在北京的贵胄学堂、俄文学堂等读书的王公子弟诺林沛勒、阿拉坦、巴克塔木吉、许长春、李芳、汪翔齐、于光昌、于捷三、吴恩和、张献廷等蒙古青年，多次探讨清朝灭亡后，“内蒙古独立自主的问题。”

早在1900年，经肃亲王善耆举荐，由喀喇沁部挑选出三百名精壮蒙古骑士，派往北京紫禁城充实禁卫军。此时，贡桑诺尔布暗中与蒙古禁卫军军官于恒山、吴伯卢、于兰斋、刘海巨等人密谋策划约定，“若遇有机会，所有喀喇沁数百名骑兵，全体携带武器、马匹，一同逃回喀喇沁旗，（举行）武装起义”④。嗣后因曹锟军队“兵变”，禁卫军更换由冯国璋督率，对马三营特别监视，蒙古军人外出时不准骑马带枪，连刺刀也不准带出，因此约定的起义计划只好暂停。同时，贡桑诺尔布与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札萨克亲王棍楚克苏隆一起，走访了俄国驻京公使，探询沙俄对“内蒙古独立自主”给予“援

助”的可能性。当时因沙俄与日本签订的“密约”规定：内蒙古划归日本的势力范围，所以对贡桑诺尔布等人的探询未作明确肯定的回答。但是，贡桑诺尔布等人认为“内蒙古要独立自主”，首先的问题是筹集经费“购买武器”、建立起一支武装力量。事实上贡桑诺尔布早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为筹备建立训练军队、警察和创办振武学堂等，已向日本正金银行贷款三万两银，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又向北京英国汇丰银行贷款三万两银^⑤。于是，贡桑诺尔布又与日本军界大间谍“大陆浪人”川岛浪速进行接触。川岛浪速提出日本军界“援助”贡桑诺尔布建立武装力量，但要以拥立肃亲王善耆，发动“满蒙独立运动”，建立“满蒙王国”为条件。1911年12月中旬，贡桑诺尔布取得日本外务省的支持。以他的领地作担保，于“民国元年（1912年）正月，贡王向北京的日本正金银行借到白银三万两。并和日本泰平公司订立了一份购买枪枝弹药的合同。言明泰平公司在南满铁路的铁岭车站交货，贡王必须派人点收”^⑥。

贡桑诺尔布通过川岛浪速从中穿梭活动，与正金银行签订“借款书”、又与泰平公司签订购买武器的“契约书”后，率同吴恩和、金永昌等蒙古青年，趁曹锟在北京发动“兵变”之机。偕同巴林右旗札萨克亲王扎嘎尔等一起离开北京，并与扎嘎尔等蒙古王公约定，待取得从日本运来的武器后，即共同举行“起义”。于是便分头返回本旗“招兵买马”，等待行动的时机。

同年2月间，川岛浪速向日本参谋本部福田部长递呈关于“分割中国策略”计划书中说，拟由肃亲王善耆和巴林旗亲王扎嘎尔等，共同建立“满蒙独立国”。由日本资助枪械，“参谋部当派高山大佐、多贺少佐、松井大尉与巴林接洽”^⑦。

贡桑诺尔布返回喀喇沁旗以后，立即召集本旗官吏们开会，会上将他在北京与各蒙旗王公和在京的东蒙古青年们讨论决定的“内蒙古独立自治”计划宣布。并说：“这几年来，开办学校，训练军队，振兴实业，一切都是为了蒙古民族的独立做准备工作。现在清朝颠覆，民国肇造，外蒙独立正是我们行动起来的好机会，如果再拖下去，就要前功尽弃了。

由日本泰平公司订购的枪枝、弹药，即将运来，需要马上派人去取”^⑧。会后，立即派遣吴恩和、于捷三二人起程前往北京，乘火车经山海关赴铁岭接取武器。同时，

他又派遣金永昌绕经巴林右旗与扎嘎尔联络取道哲里木盟郑家屯，乘南满铁路火车，由北路赴铁岭接应武器。贡桑诺尔布自以为这样安排计划周密，万无一失，只待武器运到后采取行动。不料此时日本军部，为借此机会控制贡桑诺尔布、扎嘎尔等有影响的蒙古王公，乘机造成“满蒙独立”的事实，所以，他们没有按照贡桑诺尔布与泰平公司签订的契约书，在铁岭车站卸下武器移交蒙方，而是由日本军部派人把武器押运到四平站卸下，然后把几十箱枪枝、弹药，伪装贴有“东蒙古开垦用新式农具”商标，装载十余辆骡子大车，并派遣十余名日本军界特务，穿戴中国人衣帽服装，押运经哲里木盟直接送往喀喇沁旗贡桑诺尔布王府。不意这些运载武器的大车，行至郑家屯附近时，被奉军吴俊升部发觉截获，当即将押运的十余名日军特务枪决，十余辆大车武器和车马全部没收。

消息传来后，贡桑诺尔布等大失所望，喀喇沁左右翼两旗参与此事的官吏，因怕背上谋叛的罪名，招来杀身和全家被抄查之祸，都啧有烦言，疏远了贡桑诺尔布。但是，贡桑诺尔布并不因为购买日本武器落空和本旗官吏们的反对，“就轻易地放弃了倡导内蒙古独立的全部计划”。在此前后的1至3月间，他曾分别于郑家屯和赤峰，召集卓索图、昭乌达和哲里木盟各旗部分蒙古王公开会，商讨采取共同行动的机会。据说会上贡桑诺尔布曾提出内蒙古与库伦哲布尊丹巴“独立”政权合并的主张，但是，多数与会蒙古王公们认为目前大局形势尚不稳定，一旦北京政权统治地位确立后，从自己前程和本旗的利益考虑，不能轻举妄动，所以，多数王公主张乃继续静观大局而再作定夺。

会后，贡桑诺尔布曾秘密派遣罗卜桑单珠尔前往库伦，与哲布尊丹巴接触。哲布尊丹巴甚表欢迎，并表示如内蒙古合并过来，将任命贡桑诺尔布等人为大臣。据说这一任命是由喀喇沁旗早期投奔库伦，被任命为军事副大臣的海山提议的。罗卜桑单珠尔在库伦看到哲布尊丹巴政权尚很混乱、脆弱，所以，返回后向贡桑诺尔布表示，“对内蒙古加入博克多政权”^⑨的前途表示忧虑，于是贡桑诺尔布遂打消了这种念头。在此期间，贡桑诺尔布“代表卓索图盟五旗，以保卫地方为目的”，又从日本大仓组“借日本币九万元，巴林王（扎嘎尔）也借到二万元（名义是大仓组，实际上是外务省出八万，参谋本部出三万），宾图王（棍楚克苏隆）也希望借款，因他又和俄国联系借款，没有成功”^⑩。此后，日本外务省与参谋本部，因前日本军部运送武器不密，阴谋败露，遭到国内外舆

论界大肆谴责，又慎重审查川岛浪速的“满蒙独立运动”计划与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目标并不一致，遂下令停止这一行动计划，“满蒙独立运动”即告破产。

同年六、七月间，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北京袁世凯北洋政府对贡桑诺尔布等少数内蒙古王公招募军队，购买武器等活动，引起警惕。于是贡桑诺尔布便放弃“内蒙古独立”计划，又提出先在“热河境内实行自治”倡议。8月16日，贡桑诺尔布在赤峰召集昭乌达、卓索图二盟各旗王公会议，拟讨论采取统一行动。结果因多数王公抵制未出席而失败了。10月，召开昭乌达盟和热河境内各县部分王公、士绅联席会议，会上提出：反对直隶总督兼辖热河地区，并设置蒙汉分治行政机构；将热河境内改为“自治”区域。推选贡桑诺尔布为筹备“热河自治”负责人，并向北洋政府国务院、蒙藏事务局提出“请愿书”，但在请愿书中，恐直接提出“自治”要求，有挟嫌依附外蒙古“独立”之疑，故改为设立“特别区域”的要求。

请愿书中列举历史、地理、政治、民族等缘由凡八条以证，并提出：“且热河南拱畿辅，北控蒙旗，稍有反动，即牵全局”。过去以“热河都统专管蒙旗”事务，使蒙古政务“为少数人之武断”，对于蒙民“显有歧视”。唯以设立“热河特别行政区域”，以实现民国肇建“五族共和”一律平等“之成效。

袁世凯北洋政府鉴于外蒙古库伦与呼伦贝尔宣称“独立”，对贡桑诺尔布在未遂的“内蒙古独立”失败后提出“热河境内实行自治”要求，尤为审慎警惕。故于同年10月间，袁世凯以民国政府大总统令，任命贡桑诺尔布为蒙藏事务局局长（后改为蒙藏事务院总裁），又晋升他亲王爵职，电促赴京就任。至此，“贡王此时被这样一个高官厚禄所打动，摒挡行装，欣然就道。……服服贴贴地变为袁世凯的御用工具”（11）。

注释：

①《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②军机处档案：《宣统三年十一月七日蒙古代表那彦图等致内阁袁世凯函》

③《军机处电报档》“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阿穆尔灵圭等致电清朝政府内阁电文”

④吴恩和：《辛亥革命时期回忆录》，见《内蒙古辛亥革命史料》。

⑤汪国钧：《内蒙古纪闻》手抄本。

⑥⑧⑪吴恩和、邢复礼：《贡桑诺尔布》，《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辑

⑦王铁汉：《九一八事变的起因》，见台北《传记文学》33卷3期。

⑨⑩中见立失：《贡桑诺尔布与内蒙古的命运》。引自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